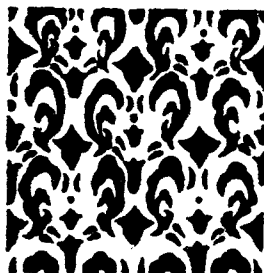


李劫人的生平和创作

李士文

李劫人的生平和创作

李士文 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秦 川

封面设计：李白桥

李劫人的生平和创作

李士文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蓬溪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0 字数250千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蓬溪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书号10316·42 定价：2.20元

写 在 前 面

应当重视和加强李劫人研究工作。

李劫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他从1891年到1962年经历的半个多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急速动荡的历史时期。青少年时代，他随着历史的变革发展而成长起来，投身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再出国追求救国救民之道，表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胸怀。抗日战争时期，他开始接近和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欢欣地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国后，他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继续奋进，为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而努力，并在文学创作中初步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毕其一生虽有曲折，但仍然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由进步走向革命的过程。

李劫人从事过多种社会活动，但他主要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创作、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报刊编辑、文学教学是他一生的主要工作。在整整五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共有各种著译近六百万字。这在现代文学史上虽不算多产，可也相当丰厚了。

从1912年到1918年，是李劫人的早期创作阶段。就目前已知的而言，这时期他有八篇小说问世。其中除一篇文言而外，其余全是白话小说。它们是我国现代小说发轫阶段的重要作品，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五四运动以后，从1919年到1926年，是李劫人创作的第二阶段，他开始了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并继续创作中短篇小说十几篇。

此后十年间，李劫人主要从事工业工作，偶有短文、译作，间断了创作。从1935年到1949年，是李劫人创作的第三阶段，也是他的创作顶盛期。在这段时期，李劫人写了四部长篇，几个短篇，一些短文和两部地方风物志类型的著作。长篇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是李劫人创作的卓著成绩的标志，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尤其是代表作《死水微澜》，更是三十年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天魔舞》也不失为四十年代的一部难得的佳作。

建国以后是李劫人创作的第四阶段，主要是加工修改长篇三部曲，也创作过两个短篇小说。

建国以前，对李劫人作品的评介是极少的。1919年，孙少荆在《川报增刊》上发表《成都报界回想录》一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唯有那老懒（李劫人笔名——引者）君的脍炙人口的小说，一名《盗志》、一名《做人难》。这两种小说是人人都称赞他好得很，因为这是实写社会的缘故。”当李劫人的短篇小说集《好人家》出版时，周太玄为之作序，称那些作品是“最实际的人生介绍文”。在1937年以前，迄今还没有发现认真研究、评价李劫人作品的文章。也许这也不足为奇，那时李劫人更有影响的作品还未问世。1937年，时在日本的郭沫若一气读完《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立即写成《中国左拉之待望》这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以左拉比喻李劫人，在文坛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郭沫若说：“前些年辰，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中国已经是有了的。”这就是李劫人的“小说的近代史”或“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他接着说：“然而，事情却有点奇怪。中国的文坛上，喊着写实主义，喊着大众文学，喊着大众语运动，喊着伟大的作品已经有好几年，象李劫人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却好象受着一般的冷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人们无暇重视这类历史题材的作品，郭沫若的呼声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

如果说，三四十年代对李劫人作品的“冷落”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建国后的“冷落”则真是令人“有点奇怪”了。建国后，李劫人受到党和人民的敬重和关怀，但评论界对李劫人仍然重视不够，“十七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没有一部提到李劫人，单篇评介文章寥若晨星。李劫人的文学成就依然被埋没着。什么原因？这同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不正常状况有关。那时，同其它战线的情况一样，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也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对已经成为历史的作家作品的评价，往往以现实需要为唯一的依据，研究工作被深深卷进了现实斗争的漩涡，许多作家作品在还没有来得及作为审美和历史研究的对象时，就被这样的浪潮吞没，冲走，在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中消失了。同时还有研究工作本身的问题：“由于现代文学本身一直是在剧烈的社会震荡和变革中发展过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新设的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五十年代初期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促上阵的，再加上这以后接连不断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使我们始终未能按照这段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出系统的考察和全面的研究，人云亦云，先入为主者很多。这些，都不限于四十年代的国统区文学。比如早在1937年就因为‘很受着一般的冷落’使郭沫若认为‘殊属墨事’，并被他比作‘中国左拉’的李劫人，近半个世纪以来仍然未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应得的位置……”①

对待李劫人的这种不公平，直到近几年才逐步有所认识，有所纠正。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正式报告中谈到三十年代文艺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时，说：“鲁迅的战斗杂文、散文和其它作品，茅盾的《子夜》等小说，叶绍钧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李劫人的《死水微澜》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这样的评价对研究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提示。此后对李劫人的研究、评介文章和资料整

理日渐多起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十四院校编写的同名著作初次把李劫人写进了文学史，表现了史家的识见。后来《人民日报》刊出《应该给予李劫人公正的评价》一文，对于扭转“冷落”状况影响更大。1983年春在成都召开了首届“李劫人创作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李劫人研究工作。

还应特别提到两位作家的意见，一是巴金，一是艾芜。1979年4月，正在巴黎访问的巴金接待了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

问：除了茅盾和鲁迅，你以为还有哪些其他的中国作家是应该介绍到西方来的？

答：李劫人的作品。他是写实主义者，描写四川的生活……②

1981年，巴金在写给李劫人女儿李眉同志的信中，建议保留李劫人的故居“菱窠”，“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

③在首届“李劫人创作学术讨论会”上，艾芜概括地评介了李劫人，称之为“了不起的大作家”④。

在香港和国外，李劫人作品也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早在三十年代就为“三部曲”所倾倒的曹聚仁先生，在他的关于现代文学的专著《文坛五十年》里竭力推崇了李劫人；“三部曲”的修改本陆续出版后，他又在几部重要著作中作了更为详细的评介，甚至认为《大波》“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般，乃是时代的真实记录”。司马长风于1975年写文章大声疾呼文坛应“注意”对李劫人作品的研究，并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称李劫人为三十年代中长篇小说的七大家之一。在谈到李劫人作品的风格时，他说：“李氏的风格沉实，规模宏大，长于结构，而个别人物的描写又细微生动，有直逼福楼拜、托尔斯泰的气派。”1978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了李劫人的三部曲，“出版者的话”中写道：“在写作上，作者吸取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表现了中

国气派,在企图解决小说创作的民族化问题上,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另一些评论家、文学史家对李劫人作品给予了高度赞许。

在日本,哲学家桑原武夫1955年到“菱窠”访问了李劫人,回国后发表《四川纪行》一文,第一次介绍了李劫人的生平和创作。“三部曲”修订出版后,日本汉学家十分重视,列为“语言教科书”。1960年5月,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发表了《被冷遇的作家》一文,为“中国的优秀作家”被“埋没”而表示非常惋惜。他花了十年时间翻译出版了《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年轻的汉学家森时彦已来成都研究、搜集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准备用五年时间翻译《大波》。已故评论家花田清辉十分推崇李劫人,把三部曲同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被誉为“里程碑”的历史小说《黎明之前》相提并论,分析了两者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在法国,法籍华人汤晋仪女士用了近十年时间翻译了《死水微澜》,于1981年出版。她认为这部作品不仅具有“社会和历史价值”,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中西影响相融合的一个范例”。此书出版后,不少报刊撰文评论,如《四川的“波娃利夫人”》、《李劫人被遗忘》、《清朝时代的中国妇女》等。据悉,李劫人作品还将被译介到南斯拉夫等国。⑤

尽管香港和外国学者、评论家的评价角度、方法和观点和我们不尽一致,但他们的许多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现在,随着“左”倾思潮逐步克服,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随着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我相信对李劫人的研究会得到加强,会日渐深入,从而使李劫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得到应有的阐明和肯定。就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固然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诸如:作家生平资料较少,特别是足以表明文艺思想的材料很缺,有待发掘;李劫人的全部著作还未弄清,尤其是一些短文还须鉴别、搜寻;几部长篇小说和已经查明的三十多个短篇还须深入研究,特别是如何把它们放到历史和文学的长河中进行纵

向和横向的宏观的考察，还是迄今做得很不够的一个工作。不过我以为，当务之急还在于微观研究，就是真正弄清楚李劫人作品的内涵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宏观研究是无法进行的，至少不能顺利进行。李劫人反映的是旧时代的生活，长篇三部曲反映的生活距今更远，而且不是那种“直奔主题”的作品，因而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不仅在一般读者中，甚至在学术界也容易发生误解和不准确。譬如，学术界出现的最典型的误解，是这样一种看法：若说《死水微澜》是一部历史小说，得不出这个结论，因为作品没有反映出历史斗争的最有份量的东西；若说它是描写成都市民阶层的平常生活的作品，倒是恰当的。不过这种描写男女关系的作品仍然不好理解，无非是个人恩怨、情场吃醋嘛，谈不上反映时代。作品中的人物给人一种恶感，罗歪嘴就是个流氓吧，蔡大嫂照说就是个“破鞋”，整个作品格调不高。作品的思想是什么，作者为什么采用这样的角度，都很难把握。

据说，这样严重的误解竟是一些人的代表意见。如果按照这种观点进行宏观研究，将把李劫人及其作品置于何地，是不难设想的，而这样的宏观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考虑到此种现状，这本小书主要从微观角度评析了李劫人的几部长篇小说，也尝试性地对李劫人的早期白话小说作了文学纵向的考察，并对李劫人的生平事迹和政治思想脉络作了初步探索，是为引玉之砖吧。

①樊骏：《在遗憾和欣慰之余——重评〈四世同堂〉引起的思索》，《文艺报》1985年12月7日。

②《巴金论创作》第38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③《巴金同志的一封信》，《成都晚报》1985年5月23日。

④《李劫人的思想和创作》，《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四川作家研究》第二集。

⑤李劫人作品在香港和国外的反响，主要依据伍加伦、王锦厚的《李劫人研究简述》一文，见《文学研究动态》1984年第6期。

目

录

写在前面

第一章 生平事迹和思想脉络

- 第一节 少年时代…………… 1
-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后…………… 5
- 第三节 在五四运动中…………… 10
- 第四节 赴法勤工俭学…………… 19
- 第五节 回国之初…………… 32
- 第六节 动荡、困苦的几年…………… 38
- 第七节 在党的领导下…………… 49

第二章 短篇小说创作成就

- 第一节 早期白话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71
- 第二节 后期短篇小说的得失…………… 89

第三章 代表作、优秀长篇 《死水微澜》

- 第一节 蔡大嫂…………… 98
- 第二节 罗歪嘴…………… 137
- 第三节 顾天成…………… 154
- 第四节 郝达三、顾辉堂等…………… 163
- 第五节 作品的思想高度…………… 167

第四章 《暴风雨前》的思想和艺术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176
- 第二节 概括时代的问题..... 179
- 第三节 主要生活画面..... 185
- 第四节 人物形象..... 197

第五章 新旧《大波》比较

- 第一节 旧版..... 209
- 第二节 新版..... 235

第六章 蒋家王朝的落魄曲 《天魔舞》

第七章 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创作..... 269
- 第二节 题材·画面·人物..... 276

后 记

第 一 节

少 年 时 代

研究我国老一辈作家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大体相同的遭际，命运和奋斗的历程。譬如李劫人和他的同乡郭沫若和巴金，就都是从封建营垒中叛逆出来，受“五四”新文化的洗礼而焕发出青春，然后出国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生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为社会的革命变革而笔耕不息，在文学事业上创造了卓越的业绩。

他们的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更为相似。

郭沫若说：“1892年的秋天生出了我。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政变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時候。”①对于长一岁的李劫人，对于小十二岁的巴金，情况何尝又不是如此呢。他们都是我们国家民族深受灾难时期来到人世的奋战者。

公元1891年6月，李劫人出生于四川成都，幼名家祥。他父亲李传芳是个下层知识分子，以教私塾和继祖业中医为生，有祖传“硃砂保赤丸”售市。劫人九岁那年，李传芳随亲戚到江西谋生，劫人随母亲移居外婆家，开始正规上学——私塾。其实这时候，劫人已经发蒙好几年了。

最先开启李劫人童蒙的文化知识来自三个渠道：一是从师读书。李劫人1946年回忆：

犹记余三岁时（大约尚未满三岁），一日，母亲率余到

外家大堂屋，在祖宗前点大烛一对，请么外公为余发蒙，照例磕头后，么外公以红单页写三字经四句，就茶几上教三次曰：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并笑曰：“好好上进，莫要学我当一辈子老童生。”大约不多几年，这位老童生便西逝了。余真正蒙师，则为十三舅父赞贤，号襄如，温江县学秀才，死才五年，已七十余近八十矣。②

几年之后，在灵官庙私塾上学时，又读《三字经》、《千字文》、《孝经》、《论语》、《中庸》、《诗品》、《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这都是当时儿童发蒙的通常教材。二是听外祖母讲故事，诸如《安安送米》、《王祥卧冰》、《孙悟空大闹天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三是到茶馆里听评书。不外《三国》、《水浒》之类故事。这就是说，最先注入李劫人头脑的是两种文化：一是封建文化，一是带有一定民主因素的民间文化。不过，一个儿童，对《三字经》、《论语》之类正规学习的书本知识总是反感的，因为哪怕把它们背诵得滚瓜烂熟也不解其意，而对祖母和民间艺人的口头文学，则很感兴趣。从李劫人后来写的纪实性很强的小说《儿时影》中，我们可以窥察到他当时的学习情况和求知心境。在这篇作品中，私塾的填鸭式教学和老师的横蛮打骂，使学生不胜其苦，常发生作弊、逃学的事，而民间艺人讲的《水浒》故事却强烈地吸引了少年李劫人。“我家门口有个茶铺，近几夜正请了一位说评书的，讲说《水浒传》，我前几夜曾去听来，十分好听”，劫人邀约同学也去听。同学听人说，“一字一句，都是人心坎上要说的。假若我们读的书，都这样有趣时，我就打死，也情愿到学堂里去。惜乎我们读的书，一句也讲不得，知道它上面说些什么！”这正是私塾学生李劫人的心声。

这同郭沫若的际遇和感受很相似：“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甚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很暧昧的哲学

问题，搬头搬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你教他怎么能够懂？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我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③但他对母亲的儿歌，大舅讲的神仙鬼怪，街上艺人讲的“我们民间的传说”故事，却听得懂，感兴趣。巴金也有类似的回忆。

在封建社会，孩子们大抵都受到这样两种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对一个作家来说，哪怕读《三字经》、《千字文》、《论语》等，也并不是全无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只有在他们成长起来之后才会显露出来，而在他们的少年儿童时期，封建文化却存在着一种危险性，就是可能僵化他们的思想，把他们陶冶成读书做官主义者。但是民间的口头文学、通俗文学毕竟更吸引他们，其中固然也有一些封建的东西，但更多的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它们同封建文化争夺着幼孩的灵魂，滋润着作家的成长。当然，他们将来究竟沿着哪一种文化的线路成长发展，还决定于人生道途的复杂因素的影响。

李劫人家庭不如郭沫若和巴金的家庭富裕。劫人父亲李传芳必须为一家人的生活而奔忙，而家庭经济拮据也必然会影响李劫人。“我九岁时，父亲以其积蓄在江西省捐了一个典史指分江西候补。这年，我随母亲到了江西南昌。母亲一到即病，三个月后右腿残废，从此不能行走。当时，父亲因为捐官把积蓄用完，母亲又重病几月，所以，我在南昌的一年，家庭异常穷困，连我的衣服都几次进了当铺。要不是后来开了课吏馆，父亲每月考上优等得奖，我们几乎饿饭。”④在这种情况下，劫人自然无钱上学，便跟随父亲读《诗经》、《楚辞》、《左传》、《唐诗三百首》等。后来，李传芳到东乡，抚州、临川的县衙门做收发、文书等差事，经济条件稍好一点，劫人这才进了小学堂读书；读了两年，抚州开办印刷局，父亲又送他去当排字工。这是1900年前后的事。当时汹涌澎湃的义和团运动震动全国，爱听故事的李劫人

知道了不少义和团英勇斗争的故事，为他后来的创作播下了种子。

李劫人当排字工三个月，父亲暴病辞世，孤儿寡母失去了生活依傍。江西是待不下去了，不得不回乡。但家里只剩下两块洋钱，如何启程？劫人说“一切事情顿时落到我的头上”。他当时才十四岁。后来他在《自传》中说：“记得当时我曾冒着酷暑步行一百八十华里到南昌找同乡、亲戚，并四处发信求援。幸抚州知府是我家同乡，帮助了父亲的棺殓。后又由亲戚帮助，我同母亲扶着父亲灵柩，搭乘一米船，由抚州河岸启程回四川。不幸在九江遇风，米船触礁，除了人和灵柩救起外，所有行李和父亲积存的许多书籍全部损失。”不过他身边的一本《七侠五义传》却完好地保存下来了。米船遇难的事，在短篇小说《湖中旧画》中有翔实的描述。

真所谓“屋漏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孤儿寡母荡然一身回到了成都，仍然在外婆家生活。“家里生活来源依赖曾祖父教书、行医所积存的三百两银子和祖母娘家帮助她的二百两银子共五百两银子，放在一个商号生息，每月生息五两六钱。此外，还有祖母制作出售的我家祖传‘硃砂保赤丸’每月也有七、八元钱的净收入。”两年后，由亲戚帮助学费，劫人进了华阳中学戊班读书。在学校里，尽管他成绩优异，终因为同学抱打不平而受到“不公道的降学处分——即将我由华阳中学降到华阳小学去”。劫人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愤然退学，于1908年秋考入当时四川最高学府四川高等学堂的附属中学。这一经历，同郭沫若多么相似！

一年半以后，郭沫若也遭到嘉定中学的斥退而来到成都进了这所中学，和李劫人同班。就在这里，两位未来的作家共同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第 二 节

辛亥革命前后

李劫人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的时候，已经十七岁了。

这种高等学堂，是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兴办“新政”的一种措施，各省皆有。四川高等学堂于1903年创建，1916年结束，教文、史、政、法，也教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开初，校长是革命党人刘士志，他为人正直，思想开明，深受学生爱戴。李劫人说，“在刘先生当监督的任内，我们学堂的学风，敢说是良好的，没有故意与管理人为过难，没有轰走过教习，没有聚众和监督开过玩笑。但是在刘先生去后的两年内，则不然了。”⑤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一书中对学校后一段的概况作过描述：教员一般水平很低，有的敷衍塞责，有的凶恶、奸险；学生许多是混资格，拿文凭，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整个学界笼罩着读书做官主义的污浊空气。“失望、焦躁、愤懑、烦恼，这几条支流汇合而成的自然是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郭沫若因此而常常举酒浇愁，尽管他并没有被污浊的气流压倒。他也记得，“王光祈、魏嗣銮、李劫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们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在郭沫若的记忆中，李劫人的形象很清晰：人不甚高，一脸的“烧疮”，有一双活敏的眼睛，蓄“拿破仑头”，戴一顶素结子的玄青布京帽，素爱整洁，绰号“精致”，加以敬爱之意，便叫“精公”了。“中学时代的精公已经是嗜好小说的。在当时凡是

可以命名为小说而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他的记忆力很强，新读过的小说能颇详细地重述出来，如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他连一些极佶屈的人名都能记忆。”同学们常常缠着精公讲故事，“他说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在场的”⑥他们常在一起玩文字游戏，如撞诗钟、对神仙对子、次韵杜甫《秋兴》八首做诗，等等。

其时已临近辛亥革命。作为省会的成都，乃四川政治、文化的中心，新旧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尽管有人回忆，四川高等学堂的“学生沉静好学，有‘尊经’（旧尊经书院）遗风”，

“学生对政治活动不甚积极”，但当时的学堂毕竟是新思潮和革命势力最为活跃之地，热血男儿仍然是不少的，甚至有同盟会员活动。那么，在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之际，学堂又怎么可能置身于时代浪潮之外呢！郭沫若正是在这里开始经受社会政治斗争的洗礼的。同样，李劫人也是在这里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潮，开始投身于社会斗争。他说：“我在中学时，喜欢看《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报》、《民立报》等。在师长中间有几位同盟会人，如监督刘士志先生和英文教员杨沧白先生。我平时肯亲近他们，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甚大。在同学中，有王光祈、曾琦、郭沫若、周太玄、魏嗣銓、蒙文通、张煦等，相互之间也有一些影响。”⑦虽然李劫人及其同学后来各有发展，但在当时，他们在民主意识和革命倾向上却是有志同道合之处的。他们参预的第一次社会斗争，就是1911年初的召开国会请愿运动。这是一次与单纯的学潮不同的政治活动。⑧

资产阶级立宪派发起的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来历已久。1908年，立宪派人正式提出了早日召开国会的要求，清廷却定“预备立宪”的时间为九年，即九年后召开国会。1909年底，十六省立宪派代表齐集北京要求两年后召开国会，遭到清廷的拒绝。1910年，各省咨议局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又进行了第三次请